

识体系：以上四者结合共同构成了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知识体系。今天，随着信息文明时代的来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浪潮，正在强有力地推动人类的社会进步，使我们站在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崭新赛道上。这表明，历史慷慨地赋予了我们新的机遇，新技术为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理论系统提供了强大动力。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学科发展从被动跟随转向主动创新，在全球学术格局中彰显中国学术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新闻传播学 研究的回望与前瞻^{*}

胡智锋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②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重要讲话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擘画了宏伟蓝图。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媒介与技术的更迭速度不断加快，人工智能浪潮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发生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的国家战略影像创作与传播研究”（23ZD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深刻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快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的题中之义。

一、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回望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立足本土新闻传播行业实践，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闻传播学科与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研究题材十分丰富，从国家宏观战略到专业人才培养，从媒介技术生态到学科自主建设，从代表性个案剖析到共性问题归纳，涉及诸多重要议题。总体而言，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出现三重转向：一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由自发探索转向自觉构建；二是国际传播研究由对外宣传转向文明交流互鉴；三是技术与媒介研究由关注新环境转向关注新对象。

（一）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由自发探索转向自觉构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在“三大体系”的建构层面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角度看，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具体行动，中国新闻传播学总体仍处于自发状态。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中国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建设打开了巨大创新空间，也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从自发探索到自觉构建的转变。这种自觉主要体现在对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关系的再认识和对中国新闻传播学主体性的坚守上。

推进中国新闻传播学科“三大体系”建设，归根到底是要加快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有学者指出：“自主知识体系是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之根本。”^① 构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具备清晰明确的学科主体意识，也离不开基础性、普遍性的本土理论沉淀。如果仅在微观层面零敲碎打，做盲目追逐热点的理论研究，就不足以支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我们“应以结构性、系统性的理论创新，为中国新闻传播

^① 周勇：《从元问题出发：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进路》，《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0期，第5页。

学话语体系建构开启理论大格局”。^①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传播学根植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实践基础上正本清源的题中之义”，^②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应当遵循相应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③ 以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丰富的传播实践活动为宝贵资源，以中国百余年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为经验来源，目标是形成有利于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事业创新发展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有学者指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广泛学术共识已经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自觉意识不断激发，学术研究与行业实践更加紧密结合，在基本概念、关键术语、理论观点等基础研究工作上取得一定的进展，自主知识体系的蓝图得以逐步勾勒。”^④ 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正以高度的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紧密结合不断更迭和重构的新闻传播行业实践经验，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中国新闻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

（二）国际传播研究：由对外宣传转向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广阔舞台，高效能的国际传播又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建设更有效的国际传播体系，因此，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重要性不容低估。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国际传播的研究，从以对外宣传为主转向文明交流互鉴，强调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国际传播问题。

第一，国际形势变化呼唤文明交流互鉴。当今世界冲突不断，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甚嚣尘上，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研究面临新挑战。有学者指出：“中国叙事和世界议题的统一，在当前我国国际传播工作中，是一个定位层面需要明确的问题。”^⑤ 中国话语、中国故事能否嵌

① 张涛甫：《立足中国现场 回应时代之问——兼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体性问题》，《新闻记者》2022年第5期，第16页。

② 赵月枝：《新时代呼唤中国传播学范式转型——兼谈斯迈思的开创性贡献》，《新闻记者》2022年第5期，第18页。

③ 参见季为民、刘博睿：《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构建：逻辑、架构和建设》，《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7期，第16页。

④ 高晓虹、李尽沙、涂凌波：《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定位与关键路径》，《中国高等教育》2025年第6期，第30页。

⑤ 周庆安、卢明江：《国际传播的中国叙事逻辑和构建优势》，《对外传播》2021年第7期，第14页。

入全球话语叙事空间,事关中国国际传播的成效。换言之,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需要强调国际传播的互动与交流,以此构建国家和民族的全球化话语叙事,“在破与立中形塑‘可被理解的中国’”。^①一方面,中国国际传播要讲好中国故事,为西方社会理解中国发展提供适应性话语;另一方面,中国国际传播还要讲好世界道理,结合本土经验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②

第二,文明交流互鉴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际传播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文化基因和思想源泉,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文化资源”。^③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合作共赢、美美与共等理念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也是做好当下国际传播工作的方法论。文明交流互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战略导向,为国际传播打开了新空间、提供了新思路。新时代国际传播要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动态过程中,“走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西方概念陷阱”,^④形成更多元的内涵价值,为文明交流对话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三) 技术与媒介研究:由关注新环境转向关注新对象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仅将技术与媒介视为新闻传播理论实践的环境背景。近年来,我国学界已将技术与媒介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并与新闻传播实践、理论进行有机融合,产出了一批聚焦新闻传播与新技术、新媒介互动融合的研究成果。

新技术、新媒介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格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开展启了人类社会的全面智能化进程,这并不是在原有的技术媒介逻辑中进行的局部改造,而是一场彻底的全局性变革。随着人工智能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全面渗透,以及对人类认知过程的部分替代,“我们越来越难

① 胡正荣、李涵舒:《图景·逻辑·路径:2021年的中国对外传播新变局》,《对外传播》2021年第12期,第4页。

② 参见程曼丽:《新时期的国际传播:挑战与机遇并存》,《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10期,第1页。

③ 陈虹、秦静:《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建构框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第56页。

④ 肖珺:《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要点》,《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60页。

理解何为知识，甚至连我们自身的主体性也模糊不清”。^① 人工智能技术塑造的传播生态格局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人与机器、人与技术、人与媒介的关系。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作为“镜子”与“他者”的作用不断凸显，“今天人类需要更多地正视机器他者相对于人的对立性、差异性及其对人类的建构与掌控作用”，^② 如此方可适应新型人机关系。

新技术、新媒介引发对人机关系、技术伦理的深度思考。数字生命、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迭代演进，激发了人们关于人类与机器、技术与方法、真实与虚拟等新问题的思考。尤其是人工智能生成领域出现了数据隐患、公正失衡、文化片面性等诸多问题，表明人类必须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建构人工智能的技术伦理规范已经变得日益迫切。^③ 人工智能技术革新已经在新闻传播实践领域产生结构性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变革要求进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调整以及相应的伦理、技术反思，否则，“人机交互时代的‘文化滞后’可能会成为智能技术发展的掣肘，并难以预见未来的危机”。^④ 厘清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技术伦理等问题，对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既是对当下发展大潮的现实回应，也是为推动技术进步投射的理性观照。

二、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整体面貌看，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无论是在回应国家社会发展现实需求方面，还是在探索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从文化强国建设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需要看，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以战略支撑力、社会影响力、本土原创力不足为突出表征。

① 姜华、李梦柯：《知识的命运：非意识认知、人工智能与知识秩序的重塑》，《现代出版》2025年第11期，第25页。

② 彭兰：《“镜子”与“他者”：智能机器与人类关系之考辨》，《新闻大学》2024年第3期，第18页。

③ 参见曾一果：《人工智能迷思与数字技术伦理的现实建构》，《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4期，第28页。

④ 陈昌凤：《人机何以共生：传播的结构性变革与滞后的伦理观》，《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0期，第5页。

（一）战略支撑力不足

有学者指出：“当前，新闻传播学的概念体系较为薄弱，已有概念的抽象程度不够、辐射力不足，核心概念、自主概念较少，概念之间的体系化缺乏。”^①这意味着，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侧重应用型、对策型研究，概念、理论和范式研究的根基尚不够坚实，缺乏对基础理论范式的根本性反思与重建。这就导致当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对文化强国等国家战略支撑力不足。因此，“有必要加强自主性、原创性的理论研究”，^②以开阔的研究视野和坚实的理论基础推动新闻传播学科战略支撑力的持续提升。

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大逻辑，不应局限在新闻传播学自身发展的范畴中，而应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层面予以考量。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涌现大量应用型、对策型研究成果，这对与行业实践保持天然紧密关系的新闻传播学而言本无可厚非，并且从某种角度看是极为必要的。但是，如果说这类研究是学科发展之树的枝叶，侧重解决在当前行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难题，那么基础型研究则是学科发展之树的根，面向更加长远的学科建设发展，重在从基础理论层面探究学科发展的元问题。“根深”方能“叶茂”，学术研究资源过度向应用型研究倾斜势必造成基础型研究的相对薄弱。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全局视野进行规划部署，兼顾应用型研究与基础型研究，为国家发展提供持久且深厚的支撑。

（二）社会影响力不足

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围绕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媒介融合、国际传播、人工智能等主题产出了大量理论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整体社会影响力偏弱，研究成果对实践的指导、对人才培养的支撑、对学科地位的巩固尚未发挥充分的作用。

一是新闻传播理论供给滞后于行业实践需求。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实践在生产传播技术的驱动下日新月异。然而，由于一些学者缺乏业界深度浸润，

① 胡正荣、叶俊：《从主体意识到普遍意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化路径》，《中国编辑》2024年第7期，第6页。

② 胡正荣、叶俊：《从主体意识到普遍意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化路径》，《中国编辑》2024年第7期，第6页。

不少研究仍停留在现象描述和热点追逐层面，缺乏对问题本质与内在机理的深入探究，导致研究多为从概念到概念的内循环式表达，难以形成对现实的有效回应与有力引领。

二是新闻传播专业吸引力逐步下降。传统主流媒体受数字化、智能化冲击，营收份额持续缩减，行业用人需求收紧，使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上升，大量新闻传播人才未能进入核心媒体岗位，转而流向企业新媒体、短视频、AI等行业领域。另外，传统培养模式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传媒行业发展，使新闻传播专业学科的吸引力有所减弱。

三是新闻传播学科主体价值偏弱。新闻传播学研究对象泛化、边界模糊导致新闻传播学研究主体含混，进而导致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模糊，削弱了学科自身的主体性价值。如果研究总是“关注无限延伸的议题，忙于边缘、交叉研究，甚至盲目地把跨学科乃至其他学科议题作为研究主体，就可能导致新闻传播学的根基不稳”。^①那么，作为基础与根本的学科主体价值就容易出现偏差，这势必影响新闻传播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削弱新闻传播学的跨学科辐射能力。

（三）本土原创力不足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本土原创力尚须进一步提升。有学者指出：“诸多知识话语和概念表述，脱离我们本土语境或问题场景，被直接挪用、移植到中国语境之下。这种知识漂流物悬浮在学科表面，难接地气。”^②学术理论的本土原创力影响知识生产、学术评价标准、问题意识等多个方面，没有强大的本土原创力，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便无从谈起。本土化发展既不意味着开展过度内卷化的“小圈子”研究，也不是为“原创”而原创，故弄玄虚地提出看似高深的学术理论与概念，而是要扎根广袤的中国大地，从大量本土新闻传播实践中汲取养分、推动理论构建。虽然在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进程中涌现了一些原创性研究成果，但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中西“学术逆差”仍然存在，大量学术研究依然将西方理论话语进行移植套用，试图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实践，或是用中国

① 胡正荣、叶俊：《从主体意识到普遍意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化路径》，《中国编辑》2024年第7期，第5页。

② 张涛甫：《立足中国现场 回应时代之问——兼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体性问题》，《新闻记者》2022年第5期，第13页。

新闻传播现象检验西方理论框架。相较而言,中国原创且得到国际学界公认的本土理论成果仍不足,中国新闻传播学处于西方理论主导的学术体系之下的困境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

三、未来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路径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数字技术深刻重塑新闻传播格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正处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历史节点。亟须打破对西方研究理论范式的路径依赖,立足“两个大局”,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构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探寻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路径。

(一) 面向世界: 在文明交流互鉴与平等对话中彰显主体性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绝非走向学术封闭,而是要以更平等、更自信的姿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中国新闻传播学应当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野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推动中国与全球学术界的平等对话。“面向世界”的发展路径包含两个层面:其一,对西方理论进行“在地化”再造与创造性转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将西方理论话语和中国本土实践对接,在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中孕育新的理论生长点;其二,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进行严谨的理论提炼,使之从中国经验升华为对全球新闻传播实践具备解释力的原创性中国理论,形成既能解释中国经验,又可为国际学界接受的学术话语。同时,创办高水平新闻传播国际学术期刊,举办重大国际学术会议与活动,系统性译介中国新闻学经典著作,多措并举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二) 面向未来: 在人工智能等新媒介新技术探究中彰显前沿性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正不断重塑新闻传播生态格局。元宇宙、具身传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前沿议题引发的现象级热点势必吸引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注意力。然而,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不能停留于对新兴技术、热点现象的描述,而应主动引领面向未来的基础理论创新。这需从数字文明层面展开深入思考,反思在机器、算法和人工智能浪潮中人的主体性问题,深入理解新型人机关系与传播伦理,强调技术与社会文化

互构的复杂关系，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由于新闻传播学研究深度嵌入新闻传播实践，面对未来中国快速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和独特的媒体平台生态，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应当为行业发展变革以及学术建构提供更多基础性、系统性、前瞻性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传播模型，为平台治理、数据主权、数字鸿沟等全球共同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

（三）面向实践：在深度介入媒体变革与回应现实问题中彰显实践性

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提炼与抽象，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持续创新根植于丰厚的实践沃土中。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扎根于以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代表的新闻传播实践。理论与实践应当保持一种良性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研究者应当深入新闻传播行业实践一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行业关键改革痛点及社会文化发展命题，树立跨学科的问题导向，将鲜活生动的代表性案例转化为厚重的创新性理论；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将创新理论积极应用于人才培养、媒介变革、国际传播等实践领域，用优质理论指导行业实践发展。在“理论—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提升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影响力，赋能数智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行业发展，为行业培养优秀人才，为实践提供高质量理论指导。

迈向自主与自信：面向未来的 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与人才培养路径探赜^{*}

段 鹏

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重温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纲领性文献，对推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具有十

^{*} 本文系中宣部国际传播专项课题（Z202503）和中宣部“Z世代”项目专项经费资助项目（Z202502）的阶段性成果。